

有幸两度从师门

——忆恩师汪坦

马国馨

时光荏苒，又快到 2011 年的 12 月，汪坦恩师去世已经整整 10 年了。汪师是 2001 年 12 月 20 日早上 8:50 去世的，我中午才知道这一消息，当时正在去南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途中的大巴上，同车的庄惟敏教授得知消息后马上告诉了我，突如其来噩耗让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此前汪师虽有几次住院甚至病危，但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而这次在我离开北京前的 19 日，还刚刚给汪师和师母寄去新年贺卡，并附上了前不久和老伴一起去意大利一游的照片，想让他老人家也分享一下我们面对灿烂古罗马文化时的喜悦心情，谁料先生还没收到我们的贺卡，就远离我们而去了。

回到北京后，27 日上午在八宝山和汪师告别之后，下午到清华又参加了先生的追思会，在缓缓的古典音乐背景下，先生的同事、学生们深情地回忆着他的为人、治学、传道、解惑……，这些发言都刊登在《世界建筑》2002 年第 2 期上，当时我正开始学习写一点诗句，于是十分认真的整理了八句表示对汪师的回忆和怀念。

有幸两度从师门，耳提面命沐深恩。
授业传道融中外，研史立论贯古今。
会通超胜荆棘路，坦荡豁达平常心。
薪承火传志未已，德言风节遗后人。

10 年来汪师的音容教诲仍时时萦绕于心，先生去世后，《华中建筑》曾专门编发过两篇纪念文章。2006 年赖德霖学弟在《近代哲匠录》一书中特别附上了他根据汪师在 1989 ~ 1997 年间的 7 次谈话所整理的近 8000 字的“口述的历史：汪坦先生的回忆”，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并做了详细的注释。2009 年吴耀东学弟经过 3 年的编辑整理，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收录了先生赴美学习期间的 60 封家书和回国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使我们对先生的生活、思想、爱好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而自己记忆中的先生更是经常浮现在眼前。

两次受教于汪师可能就是我和先生的缘分，虽然这两次之间相隔了 22 年。1959 年我们在清华建筑系求学时汪师刚从大连应邀到清华执教并任副系主任，从二年级开始课程设计，我就分到了先生负责的小组，当时我十分高兴，而有的同学因为没有分到这一组，就不太愉快。后来我是接连 3 个学期的设计课，即教学楼、别墅和文艺图书馆设计都是由先生辅

导，从此开始了对先生的认识和了解。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学术环境比较宽松，现代建筑运动“祖师爷”们的名字开始在我们这些初学建筑的学生中传诵，尤其汪师曾经在美国建筑大师赖特那儿学习过，更是充满尊崇之情。那时我们拼命手抄一些大师们的资料，由于当时环境闭塞，很难见到欧美的资料，后在外文书店见到一本俄文版赖特著的《未来的建筑》，除文字外还有许多照片和图纸，马上如获至宝买了回来。也就是在那时第一次听到了“流动空间”的提法，虽然还是一知半解，但在谈话中也算很“时尚”了。

教学楼设计是我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设计项目，初学设计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难处可想而知。那时汪师的第一次改图，是在一张约 10cm 见方的黄色草图纸上，为我勾画了教学楼入口处的立面处理方案，用粗铅笔和彩色铅笔表示了入口柱廊和后部砖墙的关系，形成了大片阴影的虚实对比，简单的勾勒使立面生动多了。到别墅设计时提供了香山不同的地段，并都起了极富诗意的名称，如“阆凤别邸”、“静宜轩”等，我分到的题目叫“嘉树轩”，因为看了些赖特的资料，所以在设计中也竭力加以模仿，什么水平伸展的平台，镂空的大挑檐，空间的流动等都尝试一下。设计过程中没出什么大问题，但在最后的渲染表现图时却遇到了麻烦，当时的纸张很不好，也越画越急，越画越脏，到最后都没法收拾了，先生在看图的时候也极不满意，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我自然也很不甘心。但第二天就要交图，时间也太紧了，我那时住在校文艺社团的宿舍正好有一间空屋，于是我马上重新裱了一张纸，一夜没睡把表现图重新画了一张，当时是争分夺秒的紧张，自然第二天也让汪师感到十分意外，最后还得了一个好分数。近年在班长叶如棠当年的笔记里见到他手抄下我当时设计的平、立面，深感当时的稚拙。汪师母后来告诉我，先生回去时和她谈论过此事，并说：“我狠狠的剋了他一顿。”师母还说为此事先生也曾受过责难。

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就是大家到汪师家去做客，在校期间我很内向，不太和人交往，但去先生家我还是充满了好奇的结伴而行，也想看看教授家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记得好像去过两次。先生家住在胜因院的单栋平房，在我们眼里居住条件还较宽敞，虽放了不少东西，但同学们都能挤得下。第一件事是知道了汪师母就是音乐家马思聪先生的妹妹马思琚，

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大提琴，所以二人有共同的音乐话题并收藏了大量唱片。另外墙上镜框里有一幅用棕色钢笔画的赖特的小住宅透视图也让我们注目良久（后来这幅透视图还曾刊出于清华建筑系编写的《建筑画透视与技法》一书中）。我们围坐在汪师的周围，听先生讲绘画、讲音乐、讲历史……讲到精彩之处，先生会瞪大了眼睛盯住我们，提高了原本就很响的大嗓门，伴着他爽朗的笑声，我们也深受感染。记得他曾讲过梵高自残一耳的自画像故事，还讲过他每次寄信贴邮票都要注意信封的构图问题，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我们的知识视野和美学素养，以至直到今日我寄信或发邮件时都十分注意信封上的字体大小和文字的构图安排。

在以后的课程中，虽然汪师不直接教我们了，但在系里，在每年的新年联欢会上都还是能见到他的身影，当时先生还兼任清华土建设计院的院长和校工会副主席，工作繁忙可想而知。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去四川绵阳参加清华分校的现场设计，没有和班上其他同学一起毕业和合照毕业照。但现场设计组的各系同学在9月份回校后却荣幸地和蒋南翔校长等领导一起照了毕业照，汪师也参加了，那是我们在大学时期和先生的最后一次合影。毕业后不久就开始了“四清”，后来又开始了文革，清华首当其冲，建筑系更是处于风口浪尖之上，批判“反动路线、反动权威、修正主义流毒”，铺天盖地。尤其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据统计学校立案审查了1120人，定为敌我矛盾的167人，听说汪师被安上了“美国特务”的吓人头衔，并成为当时“六厂二校”诸多“典型”中所提到的重要反面教材。估计就是汪师自述中所说的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当助教时，美军到大学招人做翻译，先生也报名受训，投笔从戎，学会了打枪和跳伞，成了五人小组的翻译，战后还去了河南接收等那一段历史。1969年后到江西鲤鱼洲去走“五七道路”，分配到土木班做木工活。那时先生53岁，费麟先生曾问他是否太累，先生笑笑说：“现在已是半截子埋土里的人了，无所谓。”在当时高压和极“左”的背景下，先生精神和肉体上受到的折磨可想而知。但落实政策复出之后，先生和师母从未向我们讲过这段历史，每年校庆日回到系里，都会看到先生

在系馆门厅满面笑容的迎接大家，叙旧合影。1995年是我们建五班毕业30周年，我们为出版纪念册，特邀汪师题词，时年79岁的先生写了长长的一段话：“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可是这三十年——1965～1995却不能等闲视之，它让一代新人经受了史无前例的荡涤，值得青年们终身回忆，对老人也称得起一种来迟了的幸运，我觉得这一段变革甚至比光辉的五四时期显得更为深刻，对许多关键问题——如民主化、科学化……认识会更清醒些，一些伟大的思想如马克思主义，在那时还只是理论探讨，今天已经受了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尽管其表面现象看来似乎是不幸的，某些人为错误和弱点的暴露无（毋）宁说是一件大好事，按其本质说仍是至为崇高的，是不可动摇的。宗教者尚且以‘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渡尽，方为菩提’自励，何况是热血的革命者们呢！‘天下为公’没有错！”从中也可以看到汪师坦荡的胸怀和深湛的思考。

没想到在毕业20多年后又遇上了再入师门的机会。1987年在亚运会工程设计工作正紧张进行之时，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清华开始招收论文博士生的消息。虽然那时的设计和施工均非常的紧张，但自己也不愿放弃这个再学习的充电机会，当时的设计室领导刘克谦也十分支持，于是联系了系里主管研究生工作的王炳麟先生，他告诉我最主要的条件是45岁以下，中级职称，这两条我都恰好合适。当时还因为在设计院没评上高级职称而不太高兴，没想到却为报考提供了方便。至于专业选择和导师，考虑到自己已在设计院工作多年，最好能拓展一下设计工作以外的未知领域的知识面，加之对历史一直比较感兴趣，又从日本学习回来不久，论文的方向也想选择与日本建筑历史和文化方面有关的内容，于是在9月里先给汪师去了信，然后又去家里谈了一次。那时先生已经搬到了由吕俊华先生设计的台阶式住宅里了，房间虽然不少，但客厅里放下钢琴后就显得较挤了。汪师复出之后先任《世界建筑》的社长，又去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又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建筑理论译文丛书》拟定书目，又去各地讲学，看得出年近古稀的先生要努力把文革中失去的岁月抢回来。11月9日由汪师、陈志华师、关肇邺师3人面试一次，此后王炳麟和公共教研组的卢谦老师又口试考了一次外语，最后在1988年1月得到正式通知，总算列入汪师门墙。当时和我一同报考的还有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萧默学长，和先生当时正带的博士生赖德霖、陈伯冲、吴耀东以及日本学生西泽相比，年过不惑的我们真是地道的大龄学生了。

按规定应在两年内完成论文，但因亚运会工程的原因，最后推迟了5个月于1991年答辩。因为是在职学习，所以汪师在学校为研究生讲课时就通知我去参加。记得第一年中有那么4～5次，第一次是在先生家，作为历史教研组对新生的欢迎会，先生讲了有关看书和研究方向问题，并给我一厚沓



讲课时的汪师（1988年）



汪师 80 大寿时与众弟子 (1996 年)

下载的文献目录，当时我已完成了《丹下健三》一书的书稿交出版社，当然以此为论文基础好像容易一点，但自己还想多拓展一点，所以决定还是另选一个题目作为论文方向。又过了一周在历史教研组讨论建筑的内容与形式，因为这是建筑理论的核心问题，好像是由萧默做中心发言，列举了梁思成、刘秀峰、戴念慈、李行、侯幼斌和曹庆涵等人的不同观点进行讨论。另一次先生的讲课是在 9 月份，他所有的研究生都到场，等于彼此见面认识。要讲的是文化和科学的不同层次，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介绍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和斯科特的《人文主义的建筑》，尤其更多地涉及了后者。斯科特的基本美学观点是“移情论”，是把本人的喜怒哀乐、感情和性格都移到对象上去。在建筑评价问题上，单纯的经济标准、技术标准都有一定局限性，只有用文化、美学这条线才能解释清楚……这些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汪师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筑理论译文丛书》推荐书目中的重要著作。改革开放后，除了国外建筑师陆续进入中国建筑市场外，有关国外建筑理论、建筑美学、哲学、心理学、史学、设计方法论等重要著作的引进和补课也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理论涉及到不同时期的各种思潮，不同的视角，有些还曾被视为“禁区”，而汪师正是这一基础建设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先生主编的这批译作使我们初步了解了国外的过去和现在，对业界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就是这次讲课时汪师十分强调：“理论只能启发实践，不能指导实践。”

又过去了两个月，在冬天里先生又召我们一次，这次不知为什么选在无线电系的 3 楼，主要讲的结构主义和治史方法。前者分析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关系及存在的局限。治史的讨论可能也和先生几年前所从事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有关，这项研究最初得到日本丰田财团的资助，后来又有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建设部科技发展司的联合资助。读研期间汪师赐我的一本书就是《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天津篇》，这是由以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和以藤森照信为代表的日本亚洲近代建筑史学研究会共同出版，在日本印刷的一本普查性的档案资料，以此书作为范本，



汪坦先生 80 大寿 (1996 年)

以后又改由建工出版社出版了北京、武汉、广州等十几个分册，先生同样是这一空白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先生说：“在若干年内搞一本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现在先作准备，我觉得了解的情况还太少，虽已做了不少工作，但真要搞得像样，还要下功夫”。“光看几个点（像上海、青岛）不行，还要看这些点在面上的位置。”同时介绍了中国近代一些史学家的观点和治史方法，疑古辨伪，乾嘉考据，三通（文史通义、史通、资治通鉴），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要想治史，必须对此有所了解。”

一个月后还是在无线电系 3 楼，这次讲的是视觉艺术方面的问题。是从潘诺夫斯基的《视觉艺术中的意义》和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谈起，这二人都是艺术史学家，都与建筑有密切的关系，用建筑来说明艺术理论，先生说这是一种“基本修养书”。但是他们出发点又各不相同，沃尔夫林是形式分析的大师，关注从艺术品本身来分析艺术品，从而试图发现解释作品视觉特征的一般法则。潘诺夫斯基则以图像学研究出名，他更为关注作品的主题和意义，由此找到与作品相关的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先生在介绍塔里非的《建筑的理论与历史》文章中也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结构主义者潘诺夫斯基的理论）。先生说这些书读起来很吃力，但“对待艺术形象，必须学新的东西，并放弃旧的东西。”“像朗香教堂、流水别墅、代代木体育馆都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下面就需要引领和借鉴其他东西，例如从语言学上找到出路。”记得那天汪师还提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画论方面的内容。

由于本身设计工作太忙和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 年几乎没有再上过课，我则集中于论文写作的准备，1990 年汪师去美国探亲，年底在历史所介绍美国重游的感受并放了大量幻灯，同时也询问了论文的进展情况，我利用 1990 年底亚运会结束以后的空闲，抓紧突击论文的写作，期间汪师还曾赐书两册，一是根据我的论文内容，把别人送他的一本有关日本设计事务所的专集赐我。“日本设计”是日本一家有影响的大事务所，是在 1968 年日本第一栋超高层建筑——霞关大厦建成后从原山下事务所独立出来的一批建筑师成立的事务所；另一

册是由汪师和陈志华先生共同主编的《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建筑美学卷》，正如先生所说：“建筑现象是比较复杂的，它功能的一面作为房屋有些类似机器或器具，……在它里面，古今中外文化历史的交融渗透，也都有所体现。这当然和机器、器具大不相同，和诗歌、文学、绘画等所谓情感符号的艺术也不相同。因此，在美学中有些常见的范畴，如‘形式与内容’、‘表情与形式’、‘联想与直觉’，甚至符号的意义等，在建筑的艺术性理解中都有既相同又不相同的地方，不容易解释得清楚。我们这里对文献的选择并没有陷入这些探讨，只是沿着一条曾经有许多人走过来的路，摘录了这段路程上对建筑审美观点实际存在的各种不同的议论，希望能得到些启发。”

到论文的最后定稿之前，汪师又做了最后的把关和指导。其中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关键之处就是几次先生都强调，不能只满足于表层结构的描述，论文不是科普文章，要加强理论性，要把深层结构的内容再发掘一些。并指出形式中包括文化和技术，后者有些是必然的，社会要进步，工业要发展，有了前人没有的东西，就会有前人没有的手段，形式必然要发生变化。但此外还有深层次的东西，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他还以结构主义举例，结构主义就是关系，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这些内在的东西就是结构。我在论文中提到“中国讲究对称，而日本更多是不对称”，汪师就提到首先对称并不是绝对的，对称和不对称都属于表层结构，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所以如此，有其文化深层的原因……当然论文最后也还没有改得完全让先生满意，我想可能就象先生在讲课中常说的：“在岸边游泳，水花可以很大，但深处却没人敢去。”

两度师从先生，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像我这样，出学校门后经过了二十几年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实践之后，有机会再次受教，体会可能更深一些。先生首先是诲人不倦的良师、名师，在清华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学识都投入了教育事业，深受众多学子的尊敬和爱戴。记得1996年5月12日，在汪师的家中祝先生的80大寿，众多老师和弟子陆续前来，先生身旁堆满了弟子们贺寿的鲜花篮，而几代弟子们簇拥围坐在汪师身旁，其情融融，其乐融融。那景象正如陈伯冲学弟在当天送给先生的条幅上所写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十分准确的写照。先生又是博古融今，会通中外的学者，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晚年尤甚。他时刻注视着学术的最前沿，不断有新的追求，新的思考，新的发现。先生在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作为，包括建筑史学、建筑美学、设计方法学，甚至包括哲学、社会学。所以听先生讲课每每感到十分吃力，因为先生的思维跳跃，天马行空，我们的思路很难跟上，也可能是因为先生是从另外的学术层面加以解读的关系。建筑学是一门复杂而又特殊的学科，常常被一些技术学科认为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而人文社会学科又觉得都是雕虫小技，缺少学术、理论

层面的阐释。而汪师的许多工作正是努力把我们从单纯的建筑功能、形式、材料、经济等物质的“器”的范畴中解脱出来，努力从社会、文化、哲学、美学等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发掘，从而更好地上升到“道”的层面，这样才能知其然同时也知其所以然，这是更高层次的传道解惑。

先生在为人处世上坦荡正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轻易附和。2000年春节到先生家拜年，当时正为国家大剧院的方案各方争论得很厉害，先生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对现方案的反对立场，并对当时我国建筑界的乱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先生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虽然对业界是开拓性的引领，但也是克服了众多困难，筚路蓝缕。记得有一次讲课时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课题有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了4万元，平均每年1万元，虽然在20多年前1万元还比较值钱，但对研究来说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但先生仍是非常乐观，一次我去医院探望汪师时，先生还特别强调，我对建筑理论的研究还是乐观的。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先生热爱生活、充满情趣、达观淡泊、处事低调。先生博学多识，兴趣和爱好涉及历史、音乐、美术、文学、哲学等诸多方面，半个世纪以前他从美国给师母的信中，列出了大量的书单和唱片目录，谈了许多对音乐家和他们作品的评价和看法，很有见地。有一次去探望住院的先生，还给我谈了好多音乐的事情，并告诉我一定要有一个较好的音响。还记得1991年春节期间的初四，先生邀萧默和我们全家去他那里做客，除了讨论我们论文中的问题外，一起看幻灯，聊天，而师母和“夫人”们一起拌凉菜、煮饺子，充满了家庭般的欢乐，这难忘的春节、温馨的春节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始终有一种感觉：汪师精力充沛、思想活跃，还有许多事情计划要做，他的思想体系还在逐步完善和成形之中。先生去世以后的第四天，我去安贞医院看望住院的师母，马先生给我谈的一些话更加深了我的这一感觉。马先生说：先生想把去赖特处拍的许多照片配上文字出一本书，但没有完成。原来还想出3本书，也没有动手。他也想把过去讲课的录音整理好，要是放在现在可能就讲不出来了。但必须要补充修订，还要配上插图，有的甚至要否定，重新认识。

先生常有忧国忧民之心。他觉得现在大家就注重钱，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先生晚年很寂寞，他非常希望大家来，讲讲外面的情况，一起讨论。

……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汪师，常怀赤子之心的汪师，忧国忧民的汪师，坦荡正直的汪师，敢于否定和自省的汪师，充满情趣的汪师，在这样的恩师身边，我自己忙于事务，疏于学习，失落了多少次求教解惑的机会，怎不让人遗憾呢？■